

三种取向：抗日战争时期国人的出版自由观

郭 毅

摘 要：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社会民族危机深重，这一时期，国人的出版自由观念呈现出三种取向：保守观点以三民主义为理论基础，认为战争环境下应对媒体加以限制，实施新闻统制政策；激进观点认为越是处于国难越要放开出版自由，不应有所限制；折中观点认为可以加以限制，但是要讲究尺度。三种出版自由观念取向，具有各自的社会基础，缘于一定的历史语境，三者相互博弈，也对当时的出版自由政策产生了现实影响。

关键词：出版自由；新闻自由；抗日战争；思想史

作者简介：郭毅，男，博士生。（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悉尼，2212）

中图分类号：G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6552（2015）01-0065-07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而后日本全面侵华，中国抗日战争由此拉开序幕。

曾有学者指出，“抗战时期，人们有关新闻自由的认识基本达成一致：新闻自由不是绝对的自由，新闻自由必须受到种种限制。”^[1] 这一观点既有一些道理，但也失之绝对。实际上，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思想界对于出版自由的态度却要复杂得多。除了持上述一派相对保守的观点之外，还有两种观点不可忽视，一派是截然相反的较为激进的观点，认为越是处于国难越是要放开出版自由，另一派的观点相对折中，强调既要适当统制又要注意统制的尺度。这三种观点共同构成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思想界对于出版自由观念“左中右”的三种取向。

一、保守观点：三民主义出版自由观

保守观点主要以三民主义为理论基础，认为在特殊的情况之下，出版自由应该得到限制，并力主新闻检查制度。

三民主义理论家、《前锋日报》社长刘伟森在《战时新闻事业之统制》中说：“战时为一国兴亡盛衰之系，举国之事业人才，自应聚合于整个国策下，统一指挥，整齐步武，集中使用，以宏效力。”他进而指出战时新闻检查对于“民主的英美，尤其不免，苏德意等国自不待言。战时国家应时势的需要，有许多军事上和外交上的事机，足以破坏军事上行动，泄露外交秘密，助长敌焰或致本国人心发生坏影响者，以定取舍之必要。故新闻检查的目的，是在整个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审定新闻及言论之去取。”

刘伟森认为，在欧战中，美国、英国和德国分别采取了这三种形式。“吾人意见，主张我国在抗战时期，采取德国式”，即采取均权制。他还主张限制外国人在华办报，因为“我国各重要商埠，外人所办的报纸及通讯社很多，势力亦极大，中国人读外国报纸的不在少数，中国报纸的材料靠外国通讯社供给，尤占很大分量，新闻事业为外力所侵入，危险孰甚！在国防文化口号高呼声中的时代，我们坚决的主张，封闭敌国在我领土内的报纸和通讯社。”^[2]

战时出版自由的保守观点，在当时的报刊评论中很常见。《礼拜六》杂志发表的《言论自由与统制》认为，“无论舆论也好，新闻也好，过度广泛的无限制的自由的要求，固然不特是空想，而且是不

合理的。世界上绝没有绝对没有范围的事,何况吾言论界负有传布消息,发抒政论的责任,执左右社会舆论的权威,对于政治的记载,思想的介绍,轻重得失,有关民气兴衰,国运隆替,自得特别慎重。尤其在世界动荡,国家危恶的时候,夫欲唤起民众,一致步调,相当的接受政府合理的统制,不能即谓自由的剥夺,故原则上并无怎样反对的理由,”关键在于“政府当局方面,看怎样能善为运用,以收统制的实益。”^[3]

《国是》杂志发表评论员文章也指出:“其所以有审查机关之组织,对于出版物实施局部检查,对于人民之言论著作出版等,不能不稍加限制者,旨在防护国家机密,集中人民意志,维持社会秩序,民族利益,以冀达到抗战必胜,建国必成之目标也。”^[4]

《新民报》总经理陈铭德认为,虽然“根据学理和事实的证明,严格的新闻统制政策,反是以障碍新闻事业的发展,反足以障碍学术思想文化的进步”。但是当时国人的媒介素养水平有限,因此在特殊的情况下实行新闻统制是有必要的。“世界上除了真正的民主政治国家,他们的政治已上轨道,他们的人民知识程度也很高,他可以放任各党各派去自由活动,而听其自由主张,自由发表消息,不加以严格统制外,其余国家都没有不施行新闻统制政策的。所不同者只是程度上的差别”,所以战时对于出版自由的限制,“便是在极端实行民主政治的国家,他也是绝不反对,而且是一样要实行新闻统制政策的。”^[5]

《胜利》杂志的评论员文章也认为,“在原则上说,言论是应该自由的,但是合理的统制,在目前动荡的国际状态中,或国家处于非常时期内,也非绝对不可行的。”他同时指出,“中国人民在战时所享受的言论自由权利,实无殊于平时。欧战时各参战国无不对人民之言论自由,加以重重的限制与干涉,而在中国不通强调其平时的几个原则而已。”^[6]

香港《国民日报》也撰文指出,“为什么言论不能完全自由呢?这理由极其明显。譬如,现在中国正为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而战,为国家民族的利益着想,能容许少数人发挥其汉奸理论吗?如果有汉奸在内地鼓其如簧之舌,替日本侵略者做分化中国,促中国内部发生叛变的工作,这也不该加以限制吗?”^[7]

马星野是国民党内著名的“三民主义新闻理论家”。他从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毕业后,回国主持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新闻系长达14年,他的学生遍布当时中国各大新闻媒体,而他本人也在党内担任新闻官和《中央日报》社长及《报学杂志》主编,在当时新闻学界和业界很有发言权。面对抗战时期的出版自由政策,马星野提出战时应当自律与他律结合,尤其重视他律。他认为:“即民主国家如英美,大战期间,新闻检查之严厉,非一般人所能想象。盖前方战士以血肉来换胜利之时,一切一切当为胜利之目的而牺牲,新闻自由当然亦在应牺牲之列。”但是他也指出,“新闻政策之效,重要点不在于限制出版品及检查新闻,而在于积极使中国报业发达,使报人之程度提高。使报人本身,自己制裁,或互相制裁,组织训练为目前不可缺少之图。”^[8]

这一观点被他的学生汪惠吉所继承。她在《新闻学季刊》发表文章指出:“新闻界的同业,能够站在道德的观点上,有一种类似职业公会之组合,在这个组合之下互相竞励,无论在舆论本质上,或是新闻技术上,都能发生一种‘自净’‘自纠’的作用,这就是最理想的新闻检查制度。”^[9]

为了配合新闻统制宣传,一些关于战时言论出版自由政策的专著得以出版。1939年上海独立出版社出版了由张九如、童蒙圣、马星野等人汇编的《战时文化出版自由》一书。该书导言称:“考出版自由的目的,固在促进人民道德知识之发展,与夫社会之进化。唯此种自由,即在平时,法律亦订有一定之范围,即人民在法律允许之范围内,均可享受出版自由。而一旦值战争或其他非常变乱之发生,各国对于此项自由,自亦与人民其他自由一样,常加以严格之限制。”文章为新闻统制政策辩护道:“抗战时期,中央感于言论宣导之重要,为加强宣传效能,防止有不利抗战的言论发表,特采用原稿审

查办法。现在参政会以保障出版自由的理由，主张撤销这个办法，以为这个办法撤销之后，就可以保障出版自由，这理由显然是不十分充分的。”他指出，既然当时社会上已经基本承认战时对于出版自由进行特别的规范和限制，“那么就不必以保障出版自由做题目。因为大家心里都明白一个国家在战争期间，这个‘自由’是要大大受限制的，谁也不能自己有自由，而不许旁人有自由，因为自由是平等的。如果说知识阶级就不会误用自由，一大批一大批的汉奸难道都是无知识阶级的群众？”^[10]

1941年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战时新闻检查局印发了孙义慈的专著《战时新闻检查的理论与实际》。有学者评价此书“公然宣扬‘新闻检查天然合理理论’，认为‘关于国家在政治上的设施，如果没有达到发表的时机，而新闻记者已有所闻，骤然发表，只能影响国家政策的推进。所以新闻检查制，与其认为取消人民言论自由，毋宁说是帮助记者的自由论’。”^[11]《战时新闻检查的理论与实际》虽然没有正式出版，但由战时新闻检查局印发，供新闻检查人员参看。

二、激进观点：越是处于国难越要出版自由

当时还有一种截然相反的观点，认为越是处于国难之中，越应该出版自由。

陈彬龢（1897—1970）是民国时期的著名报人，抗战期间（1932年起）史量才请他主持《申报》社论，后来更是接替史量才出任《申报》社长。据民国报人何济翔的口述史回忆，陈彬龢主持下的《申报》社论曾“在上世纪30年代风行一时”。^[12]陈曾在《申报》发表了一篇名为《为争言论自由致汪精卫先生书》的文章，认为“政治之丑恶，非可掩饰。世界人士之耳目，亦非可蒙蔽。抑且惟勇者乃能承认事实之真相，惟智者乃能从事实中求出路，掩饰与蒙蔽，不仅无益，抑亦不必。处于今日情势之下，朝野固然绝对对应一心一德，但此为指一心救国，一心共赴国难而言，绝非一心掩饰事实之真相，自欺欺人，以误国亡国也”。他认为，在抗战的形势之下，“一方面固应一心对外，另一方面亦应一心治内，脱人民对于政府所有陈述与批评，即为朝野交恶，为非国之福利，则势之所至，必人民对于政府不论其为得为失，为混乱为清明，国家之为危为安，皆置之不闻不问，三缄其口，噤若寒蝉，而后始可谓为‘朝野交恶’。然而此又果可谓为‘国之福’耶？”也就是说，在“一致对外”的情况下媒体依然可以监督政府。政府“唯有接纳人民之公意，博采人民之言论，以为改造之标准，唯有就自身之缺点，考虑人民之批评，使大众为推进自身之动力，而不应使自身为阻滞大众之障碍，尤不应就自身之立场及利害，判断批评之当否，更不应讳疾忌医，缄人民之口，而制止其发言，束缚人民之神经，而制止其思想”。^[13]后来，他在《言论自由之真义》一文中，甚至认为，正是因为“目前我国国家正值大难当前，打破国难，民皆有责，故人民固应随时发表其意见，贡献其思想，而政府尤应竭诚纳采人民之公意，采取人民之言论，以为救国之方阵”。^[14]

《申报》记者何子恒在《言论自由的理论基础》一文中也提出完全相同的看法：“若政府的一个政策与一个法令或政令出来，必须经过与此政策，此法令，此政令，有切身利害的个人或团体，或发表意见，或加修正，或加否认。若不先得利害有关者的明认或默认，决不能视为有效。这是政府政策政令法令需要人民自由发表意见施以批评或者否认的唯一理由。”他进一步写道：“政府中人，并不都是见事透彻万无一失的人杰，他们的见解认识，容或错误；他们的措施，容或不切人民的需要；他们的环境，容或不见民间的实况；他们容或受了蒙蔽，有所不见。凡此种种毛病，若有健全的言论自由，那他们的过失也就少了。”^[15]

胡适在与汪精卫和蒋介石的通电中也认为：“报纸与杂志既须正式登记立案，取得了出版发行的权利了，政府至少应该相信他们自己能负责任。他们的新闻有错误，政府可以命令他们更正，今日种种检查审查的制度实在是琐碎，而不必要的。至于因为一条两条新闻或一篇两篇社评的不合某人的脾胃而就执行停止邮寄，或拘捕记者，或封禁报馆——这种事件实在是把一个现代政府已降低到和旧日张

宗昌一辈人的政府做同辈。”^[16]

《民主周刊》发表评论员文章也指出：“我国战时新检，与英美这些民主国家大异其趣。英美的战时新闻检查，是名副其实的 news check，它只检查涉及国防、外交、军事秘密的新闻，而不检查言论。它的作用是对外而不是对内的。我国的新闻检查呢？它不只检查军、政、外交、社会新闻，更进而检查社论，短评，甚至专电也不放松。因此，我国的战时新闻检查与英美这些民主国家，是有本质上不同的。”^[17]

《新华日报》总编辑华岗认为，“在不违反三民主义及民族统一战线之原则下，言论出版之自由不仅需要，而且更为必要。”他主张撤销国民党颁布的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及抗战期间图书杂志审查标准，指出：“政府所要人民牺牲的自由，是那些不利抗战，不利国家民族的自由，恰恰相反，一个贤明的政府对于能够增加抗战力量，帮助动员的民权自由，只应加以积极的培植和扶持，决不应加以消极的限制和束缚。……抗战的利益与民权自由不仅不相抵触，反而是相因相成，所以对于人民的出版言论，我们要求政府的是积极领导，而不是消极的限制。”^[18]

出版得自由，非但不阻碍抗战形势，反而有利于抗战。1936年教育家陶行知开始推行国难教育，并将之作为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汕头市教育会会刊》刊发评论文章，针对政府推行国难教育发表了观点，号召政府应在国难之时给予言论界自由：“爱护国家，唤起民众，原为报纸之天职。自九一八以后，国内外所有华人自办之报纸，俱恪尽职守。对于地方之暴行及其阴谋，恒尽量揭载，冠之以富刺激性之标题，申之以警且愤慨之言论。同时对本国政府及民众协同救亡之工作复有相当之贡献。中国之不即沦亡，报纸之力非可诬也。”“我贤明之政府，果欲实施国难教育乎？即对于言论界应当予以相当之自由。”^[19]

当时外国人在中国开办的英文报纸也对中国战时的出版自由问题进行了观察和评论。1935年4月由美国人在上海创办的英文月刊《远东评论》（The Far-Eastern Review）发表的名为《中国出版的新趋势》（New Trends in the Chinese Press）一文，对中国报界愿意接受战时新闻检查表示失望：只有少数中国人笃信出版自由在这个国家发展的阶段是可能的或被渴望的。主要的发展可能性是在审查制度的实践方面。现行体制是不明智的，甚至在很多方面都是愚蠢的。比如，压制了关于山东救援的所有细节，救援受到了在中国领海的英国海军的影响，而这一真相被审查者压制下去了。中国的出版人应该将出版自由原则视为信念，并为之努力。他们应该争取并证明他们可以实践它。在英美等国，出版从业者有一个强大的行业联盟。无论何时，涉及出版自由的问题发生，报人都能够忘记党派和个人的纷争，言行一致地就像一人（来抵抗）。在中国没有这样的行业联盟存在，就当前情况看，出版自由实现的可能十分渺茫。”^[20]

但是在当时，也确实有一些别有用心之人，借要求出版自由之名在破坏中国的抗战局势。如吴诗梦在《从宪政实施谈到言论自由》中大谈言论自由，认为既然言论自由就是可以“以个人的立场，政党的立场，倡行主义或申述计划”。^[21]但是她在下文中竟然以言论自由的名义，为汪精卫倡导亡国论的“中日亲善”主张作辩护。她指出，既然“发表个人立场”是言论自由的表现，那么汪精卫提出“中日亲善”是其自由，民众不该批评。日本侵华后，提出了“中日共存共荣”、“建立东亚新秩序”等灭亡中国的奴化主张，而汪精卫却利用各种喉舌媒体，如《中华日报》、《和平报》、《国民新闻》、《大东亚杂志》等为“中日亲善”宣传造势。在这种背景下，吴诗梦假借言论自由的名义为汪精卫的言论作辩护，不仅是（故意）搞不清楚什么是言论自由，更是为虎作伥。安徽大学教授印维廉毫不客气地指出，“在出版界阵营里，不免有少数别有用心之徒，散布各种动摇人心破坏抗战的谬论。”^[22]可见在当时，借出版自由名义，破坏抗战的反动言论应该不止吴氏这一例。

三、折中观点：可以统制但要注意尺度

此外，还有一种相对折中的观点。留美归国的外交官高士铭认为：“固然，在这内忧外患交逼的非常时期，政府为集中意志，划一步骤起见，统制舆论及出版，也未尝不可。不过统制应该有相当的限度，合理的方法，于统制之中带有保护的成分，一味的压制，不但得不到统制的功效，恐怕还有意外的危险，摧残民气，沮遏文化，甚至招致民怨，于反动者以煽惑的机会，酿成重大变乱，这都是极可能的危险，绝不是我们过甚其词。”^[23]

汪惠吉也认为，“检查者与被检查者，绝不是相互站在敌对地位上的。他们却同时站在文化和宣传的一条战线上，为国家奏一桨之功”，因此要“使言论自由和言论统制这两种不同的理论，在实际上却相互制衡、调和、领导一国人民的思想与言论到达至善的途径”。她还特别指出“战时所行的新闻统制，不过是战时的权宜办法，在抗战胜利以后，在人民知识水准普遍的提高以后，我们非但不借国家某种行政机关来抑制危害国家民族的言论，并且政府还时时要倚重尽善尽美的舆论来推动政治上的兴革事宜。”^[9]

《现代青年》月刊主编赵家欣一方面认为，“在合理的限度下，我们不反对新闻检查制度，尤其是在对外争求民族独立解放的斗争的现阶段，为了避免无形中供给敌人情报材料，为了健全战时新闻政策，战时新闻检查局的设立，更是迫切的需要”；另一方面指出，“新闻检查机关必须是与新闻事业相辅而行，非但不要妨害合理的言论自由，而且必须如指臂似的灵活地运用，共同负担战时宣传政策的推动作用。”他批评道，“自从有新闻检查制度以来，新闻检查机关与新闻出版机关，往往形成敌对的地位，许多检查机关的负责人，因不了解检查制度的真义，只是消极的检查新闻了事。通常设有检查机关的地方，大都是新闻事业比较发达的城市，至少有两家以上的新闻纸出版，以消极地抽检新闻为最大责任的检查机关，因为检查员眼光学问的差别和主观见解的不同，同一则新闻，往往甲报被检，乙报却登出来。因此而引起新闻工作者对检查机关的不满，逐渐形成对垒的地位。”^[24]

四、战时新闻检查制度的规范化

虽然无法评价上述左中右三派观点谁的影响力更大，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诸多观点的博弈确实带来了战时新闻检查制度的规范化，这也就意味着，战时新闻检查制度是不同于以前的严厉检查。

1938年第四期《战时记者》杂志全文刊登了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战时新闻政策。其中第二条“调整新闻宣传机构办法”中规定：“改善新闻检查制度，使不仅实施消极的检查工作，更应推行积极的指导任务。”具体包括：其一，“统一全国新闻检查机关，新闻检查所应由全国新闻管理机关统筹支配，务使政府确实之方针，不受任何地方关系之限制”；其二，“新闻检查人员之支配，其资格必须有从事新闻事业三年以上之历史，并得正式新闻机关证明，确有新闻事业学识经验者为合格”；其三，“新闻检查机关应随时召集当地报社编辑人参加谈话，共同商讨各种新闻上之有关问题及法令等，以收切实领导之效，并接受报社贡献之意见”；其四，“订定新闻检查人员之奖惩办法，如新闻检查人员违反确实‘报道原则’而滥施职权时，应加以严厉之惩处，以杜流弊，而保障合法之舆论”。

战时新闻政策还涉及了对于记者新闻采访的保障：“政府对于新闻记者应予特别优待，通令政府机关军事当局，对新闻记者之工作，尽量予以协助，并准享受交通上最大之便利”，此外，“对于新闻邮电，应由政府通令各军事当局，对持有证明文件之新闻记者，得予军事邮电递送之便利。”^[25]

不难看出，这是一个妥协的产物。但从政策文本上来看，其进步性也很明显：第一，对于战时检查有了制度上的操作规范，有利于防止因权责不明确造成的混乱。对比北洋时期的新闻检查制度，那时候内政部、参议院、国务院、统帅办公室甚至地方政府等都可以随意地查禁报刊，但是在“战时新闻

政策”中却规定了权在中央,不受地方干扰。对于检查人员的资格也有规范,并提出对于滥用检查职权的惩处,这些规范措施,实际是有利于出版自由的;第二,提出吸取报界的意见(“接受报社贡献之意见”),有利于调和当时报界和政府当局的紧张关系;第三,对于记者的采访权在军事方面给予了一定的保障。在抗战时期,因为军事新闻相当敏感,所以军事当局往往不配合记者的采访。而在“战时新闻政策”中却明确规定了军事当局应配合采访。

因此,“战时新闻政策”一经颁布,“国内各报,一律著文拥护”。^[26]《新华日报》发文称“此间新闻界人士,对之极为重视,中国青年记者学会总会,并于四日电参政会表示拥护。”^[27]《申报》发文称,“湘记者重视战时新闻政策。”^[28]《新闻政策》一书的作者孟锦华也撰文称,“这确是一般新闻界同人平时想念而不得的。”^[29]

五、结 论

在抗战时期,出版限制和出版自由的观点是并存的,而并非如之前学者所说的思想一律,这体现了当时出版自由观念的复杂性。前面对抗战时期出版自由观点的三种取向做了史料补充,借此可以看到,抗战时期的中国思想界对出版自由各自持有不同的立场和论述的侧重点。而从社会史的角度讲,这也缘于特定的历史语境和社会动因。

中国在非战争时期对于出版自由就是有所限制的(法律限制),所以在战争之际,对于出版自由进行特殊限制也属理所应当,况且在前人的论述中,也都有战时可以对出版自由进行限制的论述,^[30]这是支持出版限制一方立论的心理和知识基础。对于持这种观点的大部分人来说,对于出版自由施行战时的特殊限制,是为了一致对外,避免在宣传战上的失利。以“后见之明”看当时的历史状况,如果纵容煽动亡国论、中日亲善等言论的发表,不可能不影响到国人抗战的信心。毛泽东在1938年的《论持久战》中写得很清楚,主张亡国“这类人中国各地都有,因此,抗日阵线中随时可能发生的妥协问题,恐怕终战争之局也不会消灭的”。^[31]如果当时是一种毫无限制的出版状况,抗战局面恐怕难以想象。

当然也不排除一种可能,即政府有意以“一致对外”为借口,行钳制舆论之实,这也为当时一些国人所担忧。所以他们提出,越是战争时期,越要出版自由。持这种观点者在当时也不占少数。当然,反对抗战时期的新闻统制,除政治因素之外,还有商业因素。在政府出台各种限制手段后,最先呼吁出版自由的就是出版商。对于报社而言,出版检查意味着时间流失,新闻时效性随之消减。对于出版社而言,出版检查意味着成本风险的增加。因为制版、晒版等印刷流程都是要花销的,如果书不能出版或印成后不准发行,那么就意味着经济损失。国民党颁布“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及抗战期间图书杂志审查标准”,“大大引起全国出版界编著人之注意”后,“出版界因为与营业有直接的影响,故于八月下旬,有商务、中华、开明、世界、生活、黎明、光明、上海杂志公司等十余家书店联名具呈,吁请蒋委员长及有关当局者,要求撤销该项决定。”^[32]汉口15家书店也提出抗议。^[33]

社会思想对历史发展的反作用体现在,由于抗战时期三种出版自由取向的交互作用,战时新闻检查制度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规范化、具体化。比如抗战时期政府对于出版物的检查对象不是泛泛的,“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中对于出版物检查的对象有一个明确的限定:“各地书店及出版机关印行图书杂志除自然科学、应用科学之无关国防者及大中小学教科书外,均需一律呈送所在地审查机关。”^[33]实施检查者也必须具有一定的资格,不是谁都可以查处出版物的。

此外,借由上文的史料梳理也可以看出,抗战时期中国思想界对于出版自由观念的讨论,常常以国外为参照。在这一过程中,国外战时新闻出版政策也被大量介绍到中国,这一方面对丰富国内出版自由理论有益,另一方面也为我们当今思考出版政策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我们需要处处照搬别

国的经验从而确定自己的取舍，还是依据具体的国情制定我们的政策？

参考文献：

- [1] 李秀云. 中国现代新闻思想史 [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126.
- [2] 刘伟森. 战时新闻事业之统制 [J]. 更生评论，1937（10）：16-19.
- [3] 青浪. 言论自由与统制 [J]. 礼拜六，1937（679）：8-9.
- [4] 王德亮. 言论自由与出版检查 [J]. 国是，1944（5）：21.
- [5] 陈铭德. 抗战时期之新闻政策 [J]. 抗建半月刊，1939（1）：15-16.
- [6] 赵实. 战时的言论自由 [J]. 胜利，1938（6）：3-6.
- [7] 香港国民日报. 言论自由问题 [J]. 学生月刊，1941（4）：66.
- [8] 马星野. 论战时新闻政策 [J]. 1939（5）：9-10.
- [9] 汪惠吉. 我国战时新闻检查制度概述 [J]. 新闻学季刊，1941（4）：35-40.
- [10] 张九如等. 战时言论出版自由 [M]. 上海：独立出版社，1939：39.
- [11] 徐培汀，裘正义. 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 [M]. 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376.
- [12] 何济翔. 陈彬龢与申报社论 [A]. 顾国华. 文坛杂忆续编 [C].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75.
- [13] 陈彬龢. 为争言论自由致汪精卫先生书 [A]. 申报评论选 [C]. 上海：申报馆，1932：57-64.
- [14] 陈彬龢. 言论自由之真义 [C]. 陈彬龢论文选，上海：生活书店，1934：7.
- [15] 何子恒. 言论自由的理论基础 [J]. 新生活，1931（1）：3.
- [16] 胡适. 关于言论自由 [J]. 国讯，1935（84）：429.
- [17] 胡钊. 新闻自由与人权保障 [J]. 民主周刊，1945（9）：1.
- [18] 华西园. 保障言论出版自由与争取抗战胜利 [N]. 新华日报，1938-11-20.
- [19] 余家铭. 国难教育与言论自由 [J]. 汕头市教育会会刊，1936（6）：12-13.
- [20] Sun, J. C. “New Trends in the Chinese Press” [J]. *The Far-Eastern Review*. 1935（4）：129.
- [21] 吴诗梦. 从宪政实施谈到言论自由 [J]. 民宪（南京），1940（6）：7-9.
- [22] 印维廉. 战时出版界总检讨 [J]. 时论月刊，1941（4）：16-24.
- [23] 高士铭. 出版自由与政治安定 [J]. 正论，1935（40）：6.
- [24] 赵家欣. 新闻检查与言论自由 [J]. 战时记者，1939（11）：10-11.
- [25] 战时新闻政策是国策的一部是报人的明灯 [J]. 战时记者，1938（4）：22.
- [26] 全国新闻界拥护战时新闻政策 [J]. 战时记者，1938（4）：4.
- [27] 记者学会拥护战时新闻政策 [N]. 新华日报，1938-11-06（2）.
- [28] 湘记者重视战时新闻政策 [N]. 申报，1938-11-06（6）.
- [29] 孟锦华. 确立浙省战时新闻检查政策刍议 [J]. 战时记者，1938（4）：3.
- [30] 郭毅，郑贞铭. 王世杰出版自由述评 [J]. 中国传媒报告，2012（4）：81-89.
- [31] 毛泽东. 论持久战 [A]. 中央党校. 毛泽东、邓小平论中国国情 [C].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56.
- [32] 华西园. 保障言论出版自由与争取抗战胜利 [N]. 新华日报，1938-11-20.
- [33] 张九如等. 战时言论出版自由 [M]. 上海：独立出版社，1939：12.